

“一核多元”社会网络：理解中国社会动员能力的新视角

——基于疫情危机应对实践的思考

曹威伟^{1,2}, 张云英²

(1.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湖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多元行动者一体化的“一核多元”社会动员网络结构。执政党、行政系统、民间社会分别以“核心”“接近中心性”“弱连结”的关系模式,在网络中发挥着“统合”“联动”“黏合”的功能。“一核多元”社会动员网络结构的形成有赖于密度、连结性、组织科层等条件的作用,需通过网络的整合、流程的再造、法治的保障进一步提升社会动员网络的效能。

关键词: 一核多元; 社会动员; 社会网络; 疫情危机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0)06-0066-08

“One leadership core and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social network: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China’s social mobilization ability— Thinking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responding to the epidemic crisis

CAO Weiwei^{1,2}, ZHANG Yunying²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crisis, a “one core of leadership and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social mobilization network structure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the core and integrated multiple actors was formed. Among them, the ruling party,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and the nongovernmental communities use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core”, “close to centrality” and “weak connection” to play the functions of “integration”, “linkage” and “cohesion” in the network. The formation of a “one leadership core and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social mobilization network structure depends on the effects of conditions such as density, connectivity, and organizational hierarchy. Future optimization still needs to start from these aspects,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network through network integration,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legal protection.

Keywords: one leadership core and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social mobilization; social network; epidemic crisis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疫情发生后,中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快速地被动员起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感叹“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

员”,“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为什么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人民在危机之下可以被迅速动员起来?这种动员效率背后蕴藏着什么机理?王庆西认为国家的动员能力、社会成员的承压能力、高度的社会整合以及良性的运行机制是其基础性前提条件^[1]。李永强等提出合法性、合伦理性、合情感性分别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生成的立足之源、道义之基和共意之识,是社会动员力的生成基础^[2]。社会动员作为一种“促成个体组织起来参加集体行动的机制”,其主体和客体是被

收稿日期: 2020 - 09 - 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VVSZ020)

作者简介: 曹威伟(1980—),女,湖南衡东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社会动员与国家整合研究。

嵌入于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与组织中的行动者，其本质是两者趋向认同和一体化的过程，没有一定的社会网络作依托，要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几乎是不可能的。斯诺提出，组织和网络是社会运动动员的关键^[3]。顾尔德在研究巴黎公社时期群众动员时提出，社会是由许多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相结合而形成的复合网络，只有在考虑了社会网络的结构和复合性这两个性质之后，才能对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3]。

社会网络分析将社会网络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社会行为，认为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点（社会行动者）和各点之间的连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组成的集合^[4]，强调行动者关系、关系内涵以及社会网结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5]，在社会运动、突发公共事件处理等领域中有所应用。在国外，有学者关注到社会运动中的网络元素，认为基于邻里关系的认同感^[3]、集体行动网络的联系^[6]、社群中是否存在弱关系等是社群能否动员起来的关键。还有学者将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与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如米切尔·K·林德尔提出构建突发公共事件处置网络，整合社会资源，实现信息共享，以动员全社会之力^[7]，Kyoo-Man Ha 和 Ji-Young Ahn 则认为，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将突发公共事件利益相关者关联起来，强化沟通，有利于有效应对危机^[8]。在国内，有学者指出，目前公共组织在自然灾害救助中已经开始显现出一种模糊的、有别于传统纵向或横向行政管理模式网络运行的机制^[9]，网络成员多元且彼此间存在恰当的关系联结的网络将有利于应对未知的灾害后果，适当集权与分权的网络关系结构是保障网络有效且稳定的关键^[10]。

与西方社会社群性的、分散且小规模的社会网络相比，中国社会动员网络在“大一统”的体制下，其集中性、聚合性、系统性、联动性更为突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从社会网络的整体视角，审视中国疫情危机下的社会动员，探求国家意志如何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中，社会网络又是通过怎样的联结形成意志和行动的整体，是分析中国社会动员网络特性的重要途径，也是解释中国社会动员高效率的必要维度。笔者拟从社会网络视角对疫情危机中的社会动员进行解析，对社会动员网络的形态特征、

条件支撑、优化路径等等进行探讨，以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

二、疫情危机中社会动员网络的形态特征

自 20 世纪以来，社会动员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受社会体制、历史任务和不同主体发展状况的影响，不断地实现着网络结构的转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一种新的社会动员网络已经形成——国家不再是社会动员的唯一主体，准行政组织、企事业单位、新经济和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网民等多元主体开始发展成熟并因其自身的资源和组织优势发挥着作用，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形成了合理分权、有序协同、系统集合的“一核多元”网络结构。其中，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动员网络起资源和价值整合的轴心作用，占据较高的权重。执政党、行政系统、民间社会等行动者以统合、联动、黏合的功能特征和行动机制，在“大一统”的网络框架内各尽其职。这一网络结构既连接了公共与个人，也连接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将庞大的原子化分散无序的个体纳入社会动员的管道，是中国成功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关键所在。

（一）执政党：“核心”与“统合”

社会网络理论关切行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空间定位与其行为的关系，认为行动者在网络中的位置，有差别地占有各类资源的情况，网络成员关系的方向、密度、数量、力量等因素，影响着资源流动的效率和方式。在所属的社会网络中居于“中心”位置的行动者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和信息资源，也具有更强的权力和群体影响力，以及更积极的主动参与意愿。一个节点的中心度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中，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广大的社会资本和联结关系，对网络中的资源分配、资源流动具有主导权，成了整张网络的“中心”与“核心”。这唯一“中心”（即核心）的存在，一方面能为社会行动者提供强联结关系，增加行动者间的互信、互联、互通和资源的共建共享，另一方面又能够对动员目标、动员过程实行统合领导，依据情势变化选择多样化的策略和行动机制，社会动员网络因此而纲举目张。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即核心）地位主要体现在“政治中心”“组

织中心”等方面。

首先是以政治领袖的感召力、纲领政策的引导力、社会资源的支配力为引擎,通过将有关纲领、政策的主旨精神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辐射到社会意识之中,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政治中心”的社会网络。在“政治领袖的感召力”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通过向民众广泛传输中国抗疫的政治价值、政治原则和行为准则等,以及“率先垂范”“以上率下”的卓越领导,获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一书,习近平在2020年1月20日至9月23日期间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稿共有43篇,主要包括《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加强国际抗疫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让党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等等。这些讲话不断凝聚了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决心与信心,增进了理念认同和行动共识,使“一竿子”全局性、整体性统筹社会动员网络成为可能。在“纲领政策的引导力”方面,党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决策21次,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脱贫攻坚工作的重大决策,并以一系列微观政策配套,建构了完整的政策网络。形成了包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督导组、各地党政军民学为行动者的政策执行网络,统筹东西南北中大会战,促使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局面。在“社会资源的支配力”方面,依据事态的轻重缓急进行资源配置和整合,用10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16座方舱医院、迅速开辟600多个集中隔离点,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湖北除武汉以外的16个州市及县级市,军队第一时间紧急抽调精兵强将奔赴疫情防控一线开展救治工作,人员、资源、设备的调配协调、统一、有序,展示了协同解决复杂危机的能力。塞缪尔·亨廷顿说,“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有一个强有力的政

党。”^[11]抗疫实践表明,与西方原子化社会相比,以中国共产党为政治中心的社会网络呈现出长期的、累积性的强联结关系特性,增加了行动者达成共识和统一行动的可能性,带来弱关系所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对于成功动员广大民众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其次是打破了现代社会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社会阶层碎片化的局面,克服行政科层制按部就班、按章办事、程序主义、繁文缛节等行为缺陷,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组织中心”的社会网络。在疫情防控之初,中共中央号召“组织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把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全面动员起来”^[12],以各级党支部、党小组等为核心,建立了由中央到地方、由省市到区县、由乡到村的自上而下的层层防护网络。很多省市采取了党组织“五级书记抓防控”的机制,层层压实责任,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形成了党组织、党员率先,所有群众全面参与的格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网络的组织化程度和整体行动力。除了党组织自上而下建构的“强联系”,还有群团统战组织建构的“新建联系”,发挥着“中心”拱卫者和“结构洞”联结者的双重作用。如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组织全国各地工商联、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投入疫情防控工作,全国工商联调配物资畅通渠道、保障运输搭建平台,各地工商联支援疫情严重地区,守好自身“责任田”,广大民营企业捐款捐物捐服务,迅速复产保供应等^[13]。浙江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和省残联发出《关于助力打赢防控阻击战和发展总体战的通知》,要求工会组织协助企业健全疫情防控工作体系,共青团组织组建青年突击队、下沉到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妇联组织发动各级妇联干部、巾帼志愿者在政策措施解读、社会情绪纾解、村社一线防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等等^[14]。群团组织、统一战线一方面与同级党委存在紧密的制度联系,在资源、干部任免等多方面紧紧依附于同级党委,一方面又与群众、与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保持着紧密的纽带联系,拥有向社会延伸和扩展的广阔空间,因此能够将党的意志和国家政策传达到各类群体之中,将分众化、异质化、离散化的社会群体整合进入行动体系之中,发挥自我动员与动员群众相统一的功能。

（二）行政系统：“接近中心性”与“联动”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一个节点距离其他节点越近，那么它的接近中心性越大，其重要程度既取决于其邻居节点的数量，也取决于其邻居节点的重要性。行政系统与执政党距离最近，既是接近中心度最高的节点，又凭借其拥有的信息资源、权力等要素，与其他节点保持着较近的距离。中国行政系统以其“接近中心性”网络位置，在危机应对中重塑内部组织关系，通过机构组合、资源整合、流程重塑等措施建构起联防联控、网格化、央地协作动员网络等等，构筑了一个纵向垂直型协作、横向水平型协作、超越行政上下职能分割的网络结构，减少了各节点之间的冗余连接，提升了协同动员和整体运作的效能。

首先是形成了各节点互联互通的联防联控网络。皮埃尔·卡默兰曾针对治理的碎片化谈到，“眼下的治理与科学生产体系一样，基于分割、隔离、区别。职权要分隔，每一级的治理都以排他的方式行使其职权。领域要分割，每个领域都由一个部门机构负责。行动者分割，每个人，特别是公共行政者，都有自身的责任领域。对明晰的追求，出发点是好的，即需要区分权力、明确责任，但当问题相互关联时，当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其他问题而被单独处理时，这种明晰就成了效率的障碍。”^[15]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要做到有效动员，必须用一种联系的思维，营造一个共同参与的“生物圈”。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针对常规行政管理中部门区隔、力量分散的体制之弊，对机构、人员进行统一调度和指挥。横向上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建立、32个成员单位联合，下设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宣传、外事、后勤保障、前方工作等工作组，分别由相关部委负责同志任组长，纵向上实行部门上下级之间垂直管理，明确职责，分工协作，以高强度、突击式的工作方式完成中心任务。该机制真正实现了超越分工、整体谋划、动态调整的组织网络建构，营建了一个涵盖联动组织、联动制度、联动行为模式、联动关系等在内的治理整体。在基层，则以网格化为模式，把街道和社区细分为若干“格”实现条块管理，在网格空间内，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如巡警、环卫、城管人员，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实行“绑定性

网格下沉”，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志愿者等各类行动者共同开展社会动员、情况排查、指导服务、隔离管理等工作。透过这样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不留死角”的基层“网格化”网络，党和政府成功地将危机动员嵌入到社会之中，网格所到之处，也是动员力量的向下延伸之处。

其次形成了央地联动、集分权适宜的动员网络。央地关系遵循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自主能动的辩证统一原则，根据危机的性质、层次、程度、影响范围以及持续时间等不同进行灵活调整，实现了网络内合宜的集权与分权，在因地制宜发挥地方自主性的同时保持了央地之间的政令畅通。一方面，央地在疫情处理上有分权设置，各省可以根据疫情情况采取自主的防控举措。如响应等级的设定，由省人民政府确定Ⅰ级（特别重大）和Ⅱ级（重大），市州人民政府确定Ⅲ级（较大），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Ⅳ级（一般）。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开展疫情防控统一谋划时，地方政府必须紧密配合，严格执行，形成央地协作态势。如中央财政部对复工复产作出动员，要求加强污染防治资金管理、支持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地方政府积极配合采取了各类举措。其中，湖北省着力于简化疫情防控期间资产审批程序，吉林省对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减免1至3个月的房租，江苏省着力于学校疫情防控经费保障和学生资助工作，安徽省着力于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资金支持工作，山东省多措并举支持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重庆市制定出台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细则等等。

（三）民间社会：“弱联结”与“黏合”

社会网络分析善于通过社会联结的强度来说明特定的行为和过程，认为弱联结相较于强联结，能够在不同的节点间传递非重复性的讯息，减低社会结构的限制以取得结构利益^[16]，因此，第三方行动者更容易从网络结构位置中获取“洞效应”^[17]。包含社会组织、志愿者、网络社会等行动者在内的民间力量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能够为网络提供更多的弱联结关系，在“一核多元”社会动员网络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格兰诺维特通过分析波士顿西区“都市中的村庄”不能组织起来抵制贫民窟改造计划案例，指出西区工人阶层小团体间缺少弱关系，在成员与领导之间缺乏中间性的联系人，大

大降低了对潜在领导人的信任水平,整个社群处于片断化状态,因此不能组织起来抵制改造计划^[18]。民间社会以“黏合”为主要机制,为人员、资源提供弱联结的机会,能够为推动资源优化和重组提供机会,在社会动员网络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同时,基于平等、互惠和信任机制的“柔性力量”“自发秩序”,与执政党、行政系统等行动者的“刚性力量”“等级秩序”形成交替互补,使整个动员网络更加具有延展性和生命力。

其一,资源的黏合。根据不同阶段的抗疫形势和现实需要,社会组织发挥着服务资源、款物资源的聚合和保障作用。如在疫情防控的前期,武汉建设监理与咨询行业协会为武汉火神山医院提供服务支持,清洁行业协会进行公共场所消毒,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提供疫情科普、心理疏导、压力缓解等支持性服务,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动员会员单位为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提供无偿住宿服务,食品工业协会为火神山医院施工单位每天提供蔬菜米面肉类,浙江传化慈善基金会调动卡车司机为城市间的抗疫物资提供免费运输,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中国旅行社协会、中国旅游车船协会要求暂停电影放映、旅游经营,基金会类社会组织则开展捐赠、设立基金等^[19]。在疫情防控的后期,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协助各地企业渡过难关、复工复产,如中茶协通过直播带货、多渠道鼓励会员企业购买,公益扶贫茶项目、扶贫联合体项目等方式帮助湖北销售茶叶^[20]。在社会组织建构的“弱联结”之下,民营企业、民办医院、慈善机构、养老院、福利院、快递员、环卫工人、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各类网络节点得到了融入网络的机会,实现了各项资源的黏合重组,共同保障了抗疫的顺利进行。

其二,信息的黏合。在互联网社会,各类组织和个人被迅速吸纳进强大的信息网络之中,成为社会动员的主体。据统计,在抖音短视频上,仅“新冠病毒”的视频就多达182.5亿次的播放。其中,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发布的有关“钟南山院士建议”的视频点击量高达1.4亿次以上,且得到了大量的评论和转发。社会成员分享大规模的网络信息,共同进行科学防控、集体主义等叙事,使信息在整张网络各个节点自在流动,信息通道的通畅促进了广泛的信息黏合。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市场下沉,快

手、微信、抖音以及今日头条等APP掀起农村流量的狂潮,有效地加强了城乡之间的信息黏合,让农村地区在疫情信息的传播、接受、认知方面与城市站在了同一起点上。这也是面对疫情,即使是处于偏远乡村的农民,也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根据疫情调整习惯行为、生活方式,形成防范意识和自律行为的原因之一。

其三,情感的黏合。民间力量来自民间、服务于民间,其与政治动员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的情感黏合性。帕特南认为“粘合性社会资本”十分重要,社团成员间基于信任而形成的横向关系以及这种横向关系的高密度的社团生活,是形成有活力的文明社会的两个关键维度^[21]。在疫情防控中,社区组织、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志愿者服务组织等充分利用“熟人圈”“朋友圈”“行业圈”等粘合力高的社会资本,发动人们参与集体抗疫,提高了社会动员的效率和能力。同时,以微信群等为典型的人际社交网络,快速传播着人们面对疫情的喜怒哀乐,营建出一个泛情境的“共情”空间,使一个个虚拟的、关系高度凝聚的、结构无限灵活的精神社区得以建立起来。詹姆斯·博曼说,“依托互联网互动而形成的网络社群的崛起,掀起了一场组织形式、社会运作流程的革命”^[22]。社群的互联网化拓宽了社会资本的容量,充分发挥了弱联结的效用,为各网络之间的情感动员、情感共享提供了可能。

三、“一核多元”社会动员网络的条件支撑

苏曼特拉·戈沙尔等认为,网络结构的三个特质——密度、连结性、组织科层,皆会影响成员间彼此连接的弹性以及信息可以交换或接近的程度^[23]。“一核多元”网络的形成,是基于密度、连结性、组织科层诸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以组织、社交媒介、制度、信息等为联结纽带,拉动单一核心节点与整张网络联动联合的结构化融合,“提供了填充与联结社会中所必然存在的断裂的活力”^[24],增强了社会动员网络的多元性、一体化和内聚力。

(一) 密度:网络多元化的生成

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核多元”的社会网络,与行动者力量的变化、网络密度的增强相关。一是社会网络中的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网络社会等民间力量由小及大、由点到面,增进了社会网

络的密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有意识地培育和扶持民间力量，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各类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单位、社区、志愿者的数量激增，参与公共生活、处理公共事件的意愿和能力也得到快速增强。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0年4月21日13时，入库全国社会组织共871059个，其中民政部登记社会组织共2295个。网络力量也在新的技术支持下得到迅猛的发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年4月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已达到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正如亨廷顿所说，“政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展和是否能动员新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之间的关系”^[11]，民间社会和网络社会在社会动员网络中实现了从“缺位”到“补位”的跨越，其“自下而上”的力量为之增添了密度，也促成社会动员网络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二是基层党组织的快速发展，也使网络的密度进一步增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党组织网络的适应性调整，以及面向新兴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的快速扩张，使全国基层组织达到457.2万个，机关、事业单位覆盖率达到99.7%和95.2%，国有企业覆盖率达到92.8%，非公有制企业覆盖率达到73.1%，社会组织覆盖率达到61.7%^[25]，形成了由中央至地方、基层，面向社会全面延伸的金字塔组织结构。同时，承继列宁的建党原则，加强党组织建设、流动党员的管理和群众路线建设，通过严密的组织生活和思想教育让每个党员自下而上地整合到组织结构当中，社会网络的组织化程度、密度和粘度得到提升，社会统合和整体行动能力得到提升。

（二）连结性：网络一体化的加强

“关系”的联系对于网络来说十分重要，是把一个能动者与另外一个能动者联系在一起的重要条件。网络“一体化”意味着多个原来相对独立的行动者逐步聚合到同一体系之下，“关系”建构是其主要的驱动力。一是国家治理的系统化加深了社会网络的一体化程度。社会网络形塑着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的组织情境下设计强而有力的社会网络，可以提高组织行动的绩效，引发高质量的经

济社会行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国家治理的系统化，推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行中央的顶层设计与地方的探索实践相结合，中央的大政方针制定与地方的政策执行相结合，加强全面治理、系统治理和协同治理，形成了统筹谋划、相互配合、有效沟通、协同发力的丰富实践。在组织、社交媒介、制度、信息等联结纽带的配合作用之下，政党、行政系统、民间力量等行动者内在勾连度、关系契合度不断地上升，节点之间持续的互动、依赖与协作，使不同的网络联系成为一个更大的网络，强化社会内聚，形成一体化的宏观结构。如执政党、行政系统以“中心”节点力量带动了民间动员，在信任与协同的框架内与之进行沟通、协调、互助合作，为之提供具体的政策支持、工作平台以及意识形态话语，使民间动员力量得到合法生长；民间力量处于社会第一线，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发觉危机并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应对，向政府反映情况，从而与执政党动员、行政系统动员形成呼应；互联网则使分布于社会不同角落、呈空间离散状的各节点频繁互动起来，实现线上与线下、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交互运行，形成了一个扁平化、开放式、可动态重组的系统；行政事业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党组织成员，是民间社会与党政组织连接的“结构洞”，能够成为带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中介力量。二是集体主义信念的巩固为网络的精神连结奠定了基础。组织行为学者魁克合特曾将企业内的社会网分为咨询网络、情报网络及信任网络等三种，并视情感网络为产生信任的主要强连带^[5]，社会网络因行动者间的高度信任、频繁的信息交互和问题解决的能力而更加强劲有力。“归根到底，任何社会都是一种道德秩序”，“扎根于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26]，社会内在固有的独特文化观念、价值标准、认知习惯等，是信任机制、精神纽带的基础，使社会网络关系更加富含嵌入性且强劲有力。集体主义是扎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华民族主体心态和价值体系，它“强调国家利益在利益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使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27]，是将整张网络黏合在一起的内在文化机制。有研究者认为，“组

织的网络形式隐含的伦理与集体主义取向更一致,因此在个体服从集体取向的国家中这种组织形式更为普遍”^[28]。在疫情期间,“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上的一场硬仗”“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打断”“在疫情防控斗争中彰显伟大中国精神”等集体主义话语的生产与传播,有效推动了集体主义价值的广泛共享,每个人都深切地认识到国家与个人、家庭的命运和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进而自觉将个人利益融入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中,为各类主体超越利益、达成共识,增强网络联结力、内聚力提供了可能。

(三) 组织科层:网络内聚力的巩固

社会网络理论关注行动者的能动性,认为“行动者”“嵌入”在互动网络中,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但其行动也会使某些线段断裂,又建立新的线段,从而使得网络的结构发生改变^[5]。在中国,社会动员网络由多重组织逻辑形塑,既有执政党主导的政治逻辑、政府的行政逻辑,也蕴含着民间社会的自发逻辑等。这其中,处于社会网络核心的党,对网络结构与行动产生着深刻影响,是组织科层形成有效秩序,维系网络有序运行的关键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政治权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统摄地位进一步加强,政党的“一核”地位得到巩固。一方面,从理论上阐明了坚持党对一切工作领导的重大意义、方向原则、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等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从实践上使党的领导体现到国家政权的体制、机制、机构的设计安排、总体运行之中,体现到国家治理的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如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强化党的组织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加强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职能,统筹整合党政机构力量和资源,改革健全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等等,一系列举措使组织科层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网络的“总体凝聚力”“整合度”“向心力”大大提升。

四、“一核多元”社会动员网络的优化路径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社会动员史”^[29]。自中国革命时期开始,社会动员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和现代治理中的重要工具。裴宜理指出,“与大多数前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

中国共产党是通过经年累月、贯穿始终地对广大农民进行动员而取得革命成功的。这一丰富的革命历史在社会组织与社会管控方面使党获得了丰富而珍贵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使得党获取了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重要政治优势。”^[30]社会动员作为一项治理工具,既为党和政府所熟知、运用,又为社会普通民众所熟悉,符合多数人的心理习惯,实际上已成为内在于国家治理的“基因”式存在。如何对社会动员网络进行系统优化,从网络的总体与全局、节点的联系与结合上建立合理秩序,形成有机功能体,提升未来的危机应对效能,仍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 加强网络整合,增强网络“密度”

当前的社会动员网络中,民间力量仍然较为分散、弱小,表现出组织归属性不强、自主性不足及动员无序化等特点,执政党、行政系统与民间社会等行动者之间沟通、协调、合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网络密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11]如何以执政党为“中心”,为各类行动者营造有序参与、功能耦合的动员秩序,增强网络密度,使社会动员网络各节点之间高效衔接与全面整合,是提升网络效能的重要着力点。为此,一要为民间力量参与创造条件,使其对自我角色与责任有准确的认知,充分介入到危机动员中来,以知识、技能与资源优势弥补政党、政府在组织对接、资源对接、人员对接方面的不足,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更多职能。二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动员、网络动员、志愿者个体动员的引导,使民间动员纳入社会动员网络的总体框架,持续、稳定、有序、健康、可控地运行,巩固以执政党为核心的善治结构框架,提高执政党作为网络中心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三要推动政党、政府动员与社会动员各主体之间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共治理念,搭建联络平台,形成架构多层复合、成分多元参与,功能特色互补、职能衔接融合,机制灵活规范、运作良性循环的系统动员网络结构。

(二) 推动流程再造,激发网络“连结性”

社会动员流程再造以社会动员组织、职能、制

度之间的关系结构为着眼点,改变条块分割的运行实践,建立全连接、全流程和全过程的社会动员框架和集成、整合、协作式的动员流程,以此激发网络的“连结性”。劳伦斯·R·琼斯和弗雷德·汤普森提出,流程“重建”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改变而非固定现有的流程,以过程而非职能为基础进行组织设计,并确定其在组织图中的适当位置,以改善服务质量为焦点,减少循环时间和成本^[31]。其主要实现方式是通过以事务分类为基础的多样性制度安排,实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流程互补,推动动员流程向并联化、集成化的方向转变。如在危机应对的初始预警阶段,社会力量预先采取措施,减少、削弱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及影响,节省社会资源的付出。在危机准备和响应阶段,以执政党动员和政府动员为主,制定危机应对的法律法规和危机应对预案,开展危机应对的筹备工作,带动各种社会力量做好危机应对的准备。在危机发展中后期,大力发挥执政党和行政系统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能力,全面开展危机动员的各项工作。民间力量则通过灵活的信息渠道及时反映危机信息,承担一些政府所不能或者无法有效承担的工作,开展社会监督,协助政党和政府展开的危机应对行动。在危机之后的恢复阶段,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开展社会募集、专业化指导与智力支持等。通过流程再造,促使社会动员各类行动者实现不同任务、不同环境和遇到的不同问题的灵活机动性,并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形成协同应对、合成应对的局面。

(三) 夯实法治保障,规范网络“组织科层”

林南认为,“在制度的场域之内,行动者认可、体现和共享着仪式与行为,受到社会制度所施加的约束与激励。这样,他们降低了对行动者之间的行动和互动进行估计与强化的交易成本”^[24]。完善社会动员网络,还应理顺相关法律法规系统,规范并保障网络中“组织科层”的运行,使各类主体在法治框架内相互协调,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是要理顺社会动员的主体关系,进一步明确社会动员的实施主体、权力边界、主要内容、方式方法等,确保各类主体发起动员拥有法律授权的充分依据。二是要对社会动员的启动、终止机制等进行法制规范,限定社会动员发起的目标、程序和方式,在实施程序

化、决策民主化及监督透明化方面完善法制要求,为危机之中发起社会动员提供基本法律依据。三是规范社会动员、常规治理两者之间的切换与对接,保障从危机时社会动员的响应启动到危机过后社会机能的合理恢复、常规治理的有序过渡,全面促进社会动员体制和行为的法制化与规范化。

参考文献:

- [1] 王庆西.重大公共危机治理中的社会动员何以成功:基于新冠肺炎防控的案例分析[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0(5):43-50.
- [2] 李永强,李杰,刘金菊.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J].社会科学家,2020(7):33-37.
- [3]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30,243,239.
- [4]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4.
- [5] 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10,80.
- [6] KIRLIN J J, KIRLIN M K. Strengthening effective government-citizen connections through greater civic engagement[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2(9): 80-85.
- [7] 米切尔·K·林德尔.应急管理概论[M].王宏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3.
- [8] HA Kyoo-Man, AHN Ji-Young. Application of the “Spider-Web Approach” to Korean emergency management[J].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 Emergency, 2009(1): 1-13.
- [9] 杨博文,陈军华,何思越.公共组织网络应对自然灾害救助协同模型设计[J].统计与决策,2013(10):43-45.
- [10] 闫章荃.灾害应对中组织网络的适应性发展策略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21-131.
- [11]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杨玉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96,418,366.
- [12]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N].人民日报,2020-01-29(01).
- [13] 杨昊.同心战疫情,凝聚正能量[N].人民日报,2020-03-05(06).
- [14] 聂伟霞.我省群团组织总动员[N].浙江日报,2020-02-15(02).
- [15] 皮埃尔·卡蓝默.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M].高凌翰,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1.
- [16] 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 1360-1380.

(下转第83页)

- [33] 卢伟. 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制度设计[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34] 胡咏梅, 杜育红. 中国西部农村初级中学教育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J]. 教育与经济, 2008(3): 1-7.
- [35]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 95-120.
- [36] 李佳丽. 家长参与和代际闭合对初中生认知能力的影响——基于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37(Z2): 6-14.
- [37] 高燕. 父母教育卷入对中小学生学习成就的影响: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J]. 教育测量与评价, 2016(12): 40-46.
- [38] 李波. 父母参与对子女发展的影响——基于学业成绩和非认知能力的视角[J]. 教育与经济, 2018(3): 54-64.
- [39]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745.
- [40] 范长煜. 遮掩效应与中介效应: 户籍分割与地方城市政府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6(3): 98-110.
- [41] 方杰, 温忠麟, 张敏强. 类别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J]. 心理科学, 2017, 40(2): 471-477.
- [42] 段成荣, 杨舸.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 人口研究, 2008(3): 15-25.
- [43] 杜屏, 赵汝英, 赵德成. 西部五省区农村小学寄宿生的学业成绩与学校适应性研究[J]. 教育学报, 2010, 6(6): 84-91.

责任编辑: 黄燕妮

(上接第 73 页)

- [17] BURT R.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 Cambridge, Harvar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9-70.
- [18] 刘少杰. 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323.
- [19] 朱勤, 赵宇新. 凝聚社会组织力量,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N]. 中国社会报, 2020-02-10(01).
- [20] 胡琼瑶. 供销合作社帮鄂产茶叶“带货”[N]. 湖北日报, 2020-04-07(10).
- [21] 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 刘波, 祝乃娟,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22] 詹姆斯·博曼. 公共协商: 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 黄相怀,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132.
- [23] NAHAPIET Janine, SUMANTRA Ghoshal.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23): 252.
- [24]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张磊,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43, 187.
- [25] 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结构更加优化, 基层党组织覆盖面进一步扩大[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8-06/30/content_5302455.htm, 2018-06-30.
- [26]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9: 309.
- [27] 马尔科姆·卢瑟福. 经济学中的制度: 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8.
- [28] RONALD Dore. Goodwill and the spirit of market capitalism[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3(34): 459-482.
- [29] 李德成, 郭常顺. 近十年社会动员问题研究综述[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6): 46-54.
- [30] 裴宜理. 增长的痛楚: 崛起的中国面临之挑战[J]. 国外理论动态, 2014(2): 71-78.
- [31] LAWRENCE R J, THOMPSON F. Public Management Renewal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Stamford, Connecticut: JAL Press, 1999: 32.

责任编辑: 黄燕妮